



[编者按]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再次成为新焦点。

2008年,深圳将有机会产生一次超越型的社会变革。若规划逐步实现,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深远影响,将丝毫不逊于1979年时经济特区的诞生和1992年起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这次变革,来自一连串表面上看似独立的改革迹象:积极参与“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获批国家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上报中央、深港合作最终定调……这些迹象的背后目标直指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排头兵,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在行政改革、金融开放等方面,深圳有望再显“大国出征”之意。

深圳新一轮改革身份的确立表面上落后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甚至重庆、武汉、长沙等区域,后两者在2005年至2008年间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甚至有消息称,“五点一线”将最终定格为中国新时期“特殊经济区域”的整体格局,而最初的深圳特区已经“失宠”的坊间说法则在此前数年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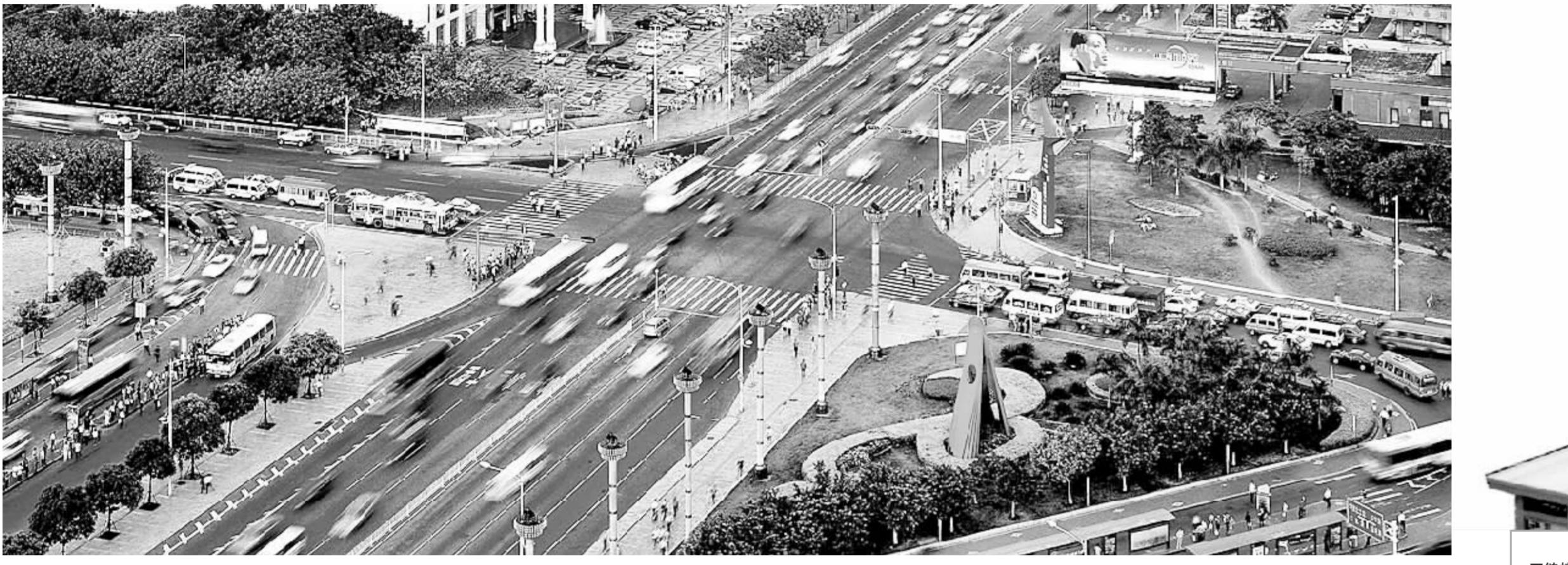
不过,深谙中国改革路径的各界资深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近日最后定版的深圳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将配合这一轮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真正引领中国此轮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创新思路,掀起中国改革“第三次浪潮”大幕,其背后是改革决策者在深水区探索时的深谋远虑与良苦用心。而深圳在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的创新传统、市场基础、民主氛围,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等等,成为深圳最终入选“创新试点”的重要原因。

此次,上海证券报推出以深圳为样本的大型调查,旨在纪念这一伟大创举的同时,更展望由此扩展开的中国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本报记者 于兵兵

深圳掀第三次改革浪潮 携港续写“春天的故事”

行政体制突破、深港金融开放等新思路“后来居上”,有望擎旗“综改”试点



深圳金融行政创新规划有望奥运后获批

◎本报记者 于兵兵

和此前几年的稳步推进相比,今年初以来的深圳“综改”明显提速。

3月份,深圳着手起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并于6月24日正式发布。内容涉及11个深港深度融合领域,争取成为国内首个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试点城市等金融新政尤其令人瞩目。另外,行政体制方面的多项改革更引起市场高度关注,包括重要干部差额选举、人大代表直选在内的多项提案被香港评论界称为新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几乎同时,深圳市政府宣布,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规划》预计在三季度出台,围绕创新基础能力体系、创新产业体系、创新资本体系等八个方面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和向任务。

7月初,《深圳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获广东省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深圳城市定位修改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一系列文件紧锣密鼓地发布,内容互有印证和补充。众多专家表示,其背后是广东今年以来掀起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甚至决策层酝酿第三次中国改革浪潮的大背景。

去年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旋即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并部署直赴长三角,考察其经济新增长模式方面珠三角的可借鉴之处。到今年3月,云贵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及各高校专家的“解放思想,东破局”的北京论坛召开,舆论声势惊动海内外。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直接参考,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在论坛上表示,如果说1979年的理论标准大讨论是“破神立人”,1992年的小平南巡是“破公私”,那么目前掀起的第三轮改革浪潮就是要突破限制中国社会和谐、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确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相匹配的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新一轮改革的平台不再是经济特区,转而叫做“综合配套改革

试点”。之所以将深圳归入“综改”,是因为深圳在这轮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等方面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港特别金融中心”的地位。”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肖志家告诉上海证券报。

对于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劣势,深圳金融办近日草拟的一份《关于深圳金融企业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的汇报》中概略为:深圳金融企业发展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深港合作还没有取得中央及有关部委的认可;金融人才较北京、上海有所不足。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数年来,深圳在全国金融市场的布局中渐显弱势。今年初,天津渤海超越深圳,浦东等竞争区域,对深圳某省委书记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对深圳在相关文件中提到的若干金融创新举措,该专家表示“通过国家审批的可能性很大”。

同样持乐观态度的还有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他在此前论坛上表示,“深港一体化”是深圳在珠三角未来发展的定位,但囿于香港自身考虑,深圳与广东省的协调,中央全局考虑,深圳在金融领域的区域布局已经迫在眉睫。

“很多金融创新的最初实践在操作中已有实验,比如深圳人到香港炒股等。另外,深圳中小私募投资基金(含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证券基金)多达3000多只,是国内最发达的私募直接融资市场。但是,由于金融创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无论是境外投资还是私募基金,其政策层面的‘正身’还是很重要的。”深圳市金融顾问团秘书长李春瑜表示。

随着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先试”的推出,金融创新领域的“先行先试”已经成为天津渤海、上海浦东和深圳三方金融霸主的逐逐角逐。天津市副市长戴相龙曾公开表示,金融创新都可以试,但天津滨海可以先试。另根据国务院相关精神,金融创新“原则”在天津滨海试行。于是,滨海新区成为近年来以来金融市场的第三“宠儿”,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金融主管等部门相关人士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低调表示,向中央申请金融创新“硬支持”的希望甚微。

然而,专家表示,深圳的机会又有不同,良好的市场基础和邻近优势是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深圳金融业要在国际先进城市,比肩成熟金融市场,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好‘香港牌’,是非常现实的资本利用的手段。”上述文件表示,而专家称,深圳正申请中央政府支持深港共建国际金融大都会的直接目标是将深圳金融业发展最终推到国家战略层面。”

根据深圳的提法,本着“学习香港、服务

香港、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原则,深圳将与香港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港特别金融中心”。其中重点工作包括,启动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使之成为“深港特别合作区”这种“回头看书籍”中当年的民主选举和青年大辩论等行政体制改革中没有涉及。

深圳改革研究学者吴中校介绍,而若干年后,深圳等特区在行政管理方式上,逐渐摸索为完全的均权模式。

另外,加强深港金融合作包括:完善深港两地的清算系统,争取中央支持,扩大深港企业间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制度,尝试允许香港和深圳居民在深港间有限开户和人民币,推动深港证券交易所在深圳设立试点;探讨“两地交易所会合”“互认”合作等。

业内人士介绍,深圳目前是中国大陆钱庄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大量民间资本的流入成为深圳发展的直接融资基础。这些资金由被配置者变身资源配置者的过程。期间,一些瞄准高风险业务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的三个必要条件: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服务、融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相比天津、上海,深圳发展金融创新的最大优势来自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圳最近认真学习了香港的金融运作和管理模式,两地金融市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差别也有了更多交叉流动机制。”李春瑜介绍,如深圳正刚刚推出的《深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市场》,它不仅规定了合格投资者的条件,也在风险控制、投资组合、投资团队组成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约定。“这种规范化的投资基金的运作方式竟然在香港得到认可。深圳下一步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还有些优势,发展私募基金无疑是深圳唯一的机会。”李春瑜表示。

随着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先试”的推出,金融创新领域的“先行先试”已经成为天津渤海、上海浦东和深圳三方金融霸主的逐逐角逐。天津市副市长戴相龙曾公开表示,金融创新都可以试,但天津滨海可以先试。另根据国务院相关精神,金融创新“原则”在天津滨海试行。于是,滨海新区成为近年来以来金融市场的第三“宠儿”,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金融主管等部门相关人士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低调表示,向中央申请金融创新“硬支持”的希望甚微。

然而,专家表示,深圳的机会又有不同,良好的市场基础和邻近优势是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深圳金融业要在国际先进城市,比肩成熟金融市场,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好‘香港牌’,是非常现实的资本利用的手段。”上述文件表示,而专家称,深圳正申请中央政府支持深港共建国际金融大都会的直接目标是将深圳金融业发展最终推到国家战略层面。”

但是,对于深圳此轮行政体制改革效果究竟会如何,业内仍存阴云。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外力和内力双向结合,在深圳以往改革之初的热火十分高涨,但目前的情况下,有多少热情会被重新唤醒,现在难以预期。”吴中校说。



■链接

深圳29年改革史

1979年,邓小平全国尊享改革开放突破口,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因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被圈点为首个经济特区。同被列为经济特区的还有厦门、珠海、汕头。(到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获准建设,使得深圳的经济特区数量最终增至5个)

1981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表态“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改革进入第二次浪潮,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深圳最终完成深港衔接历史任务。

1996年,深圳完成《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修订,目标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综合经济特区,与香港功能互补的区域中心城市,并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基地”等。

1998年开始,随着香港卷入金融危机,深圳经济开始放缓。

吴中校介绍,此前深圳一直想联手香港做大经济和金融中心,但香港对此回应较淡。期间,深圳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和CEPA正式实施,开始为深港深入合作打下基础。2003年前后,香港逐渐看到了内地市场对香港的强大支撑作用,也急需寻找后台

一个国家级战略城市的失落与回归

1979—2004:从“深圳奇迹”到“难以为继”

深圳,在它从中国南海一处小渔村变身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先锋的29年时间里,似乎从不缺少话题,只是阶段性的内容各有不同。

29年中的最初几年,深圳无疑是风光的。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深圳,尤其在资本市场竞争力开始逊色于上海等。

但其中也不排除深圳独特的“特色”使然。“新世纪特区的崛起来自各方势力的利益,有些事情做得很困难起来。另外,深圳本地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变得没有积极性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吴中校说。

“所谓特区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政策,经济政策。比如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15%,而其他区域是33%。深圳靠近香港,联系便利,有利于借鉴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框架。在执政理念上,政府不做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是以企业为主体。”深圳市商务局党组书记肖志家介绍。

此后10余年,深圳创造了许多“第一”:1980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1982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3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1984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5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6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7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8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89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0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1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2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3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4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5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6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7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8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1999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2000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2001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2002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2003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2004年深圳被列为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更令深思的是,随着深圳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人口增加,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城市人口患抑郁症比例逐年增长,城市归属感缺失;2006年精神疾患患病率全国第一,高血压全国第一;2007年深圳房价涨幅达50%的民间说法令全国“深圳速度”被冠以“深圳病魔”。吴中校说。

“深圳的政府领导在考察深圳时都说过:深圳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蔚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马蔚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法人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成果。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有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企,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化、而非政府化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同样受益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风格,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华为等一系列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深圳这片相对自由的市场上诞生。

“至今,上海的政府领导在考察深圳时仍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蔚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马蔚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法人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成果。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有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企,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化、而非政府化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深圳完胜,深圳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值得肯定,但深圳的行政体制存在一些问题,如决策层对深圳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深圳的扶持力度不够,对深圳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吴中校说。

“深圳的政府领导在考察深圳时都说过:深圳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蔚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马蔚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法人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成果。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有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企,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化、而非政府化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深圳的政府领导在考察深圳时仍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蔚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马蔚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法人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成果。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有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企,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化、而非政府化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深圳的政府领导在考察深圳时都说过:深圳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蔚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马蔚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法人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成果。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有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企,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化、而非政府